

上海鲁迅纪念馆
奔流丛书

乐融 著

永恒的缅怀

鲁迅逝世前后追踪



永恒的缅怀

——鲁迅逝世前后追踪

乐融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缅怀：鲁迅逝世前后追踪 / 乐融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535-0591-6

I. ①永… II. ①乐… III. ①鲁迅研究 IV. ①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3296 号

责任编辑 王建敏

封面设计 汤靖

责任监制 陈平 刘学

书 名 永恒的缅怀——鲁迅逝世前后追踪
作 者 乐融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91-6/K.094

定 价 39.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 话 021-64366274

| 目录 |

一、鲁迅的早逝及背后的原因	1
二、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参观的木刻展览及其他	23
三、鲁迅为什么没有易地疗养	43
四、鲁迅逝世和丧仪经过探究	63
五、鲁迅丧仪文物资料整理杂记	107
六、1936年悼念鲁迅的木刻、画像及其他	155
七、鲁迅逝世时的新闻报道概况	171
八、鲁迅的逝世与抗战木刻运动的兴起	181
九、鲁迅逝世后的一项伟大文化工程	195
十、鲁迅葬礼的社会影响	211
参考书目	235
后记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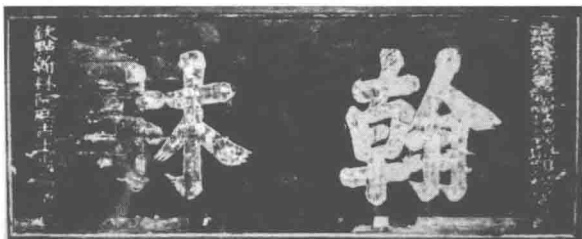
一、鲁迅的早逝及背后的原因

鲁迅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享年56岁。按照过去的说法“人生五十非为天”，鲁迅寿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本不算短。但是，他的二弟周作人1967年去世，活了82岁；三弟周建人1984年逝世，寿命更长，享年96岁。如果与他两个兄弟相比，鲁迅是三兄弟中去世最早也是寿命最短的一位。鲁迅的母亲寿命也很长，享年86岁（1858—1943年）。从遗传角度来说，儿子一般遗传母亲，周作人和周建人都继承了母亲的长寿基因，鲁迅也应该有长寿的因子，然而鲁迅却只活了56年。

是由于鲁迅在三兄弟中体质最差？是先天不足，还是另有原因？这恐怕要从鲁迅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中寻找。

小康人家的困顿

鲁迅的家族在浙江绍兴，算得上一门望族，历代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在绍兴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介孚公），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福清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



鲁迅祖父周福清系科举进士，被皇帝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图为“翰林”匾额。

特殊地位。本来鲁迅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人生轨迹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光宗耀祖。但是，世事难料，一场科场舞弊案让鲁迅的命运急转直下。

在1894年（甲午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岁，为庆祝其六十岁万寿，科举特开恩科，乡试提前一年。就是在这次乡试中，发生了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赂主考官的大案子。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辛未年进士，后任清朝内阁中书，鲁迅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周福清对大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也像自己一样，科举成名中进士。但周伯宜尽管很努力，考入秀才后，却屡屡不中。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想通过疏通官场，助儿子一臂之力。机会来了，这年周福清丁忧在家（周福清的母亲于壬辰除夕即1893年2月16日去世，按照清朝制度，官员可回家守孝三年，这叫丁忧），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的名单一公布，正主考殷如璋是与周福清同年考上的进士，二人颇有点交情。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

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①
由此事情败露，周福清入狱被判死刑。



鲁迅祖父周福清（正中者）、祖母孙氏（左）、
继祖母（右）



鲁迅父亲周风仪（1861—1896
年，字伯宜）



鲁迅母亲鲁瑞（1858—1943年）

①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 页。

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斩监候”，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元气大伤。鲁迅曾回忆：“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① 鲁迅一生中对此事说得并不多，但是，在这字里行间透露着阵阵寒意。有时候，受伤害很深的事，往往当事人说得最少，甚至要刻意回避。对鲁迅来说，这件事对他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的冲击都很大，因为，十三岁的他是长兄，已经懂事，而下面两个弟弟一个比他小四岁，一个小他七岁，还懵懵懂懂。由于科场舞弊案的株连，鲁迅父亲周伯宜被革去秀才功名，这对周伯宜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不久开始吐血，病情不断加重。身为长子，尚未成年却已懂事的鲁迅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饱尝了人间冷暖，“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② 每天他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花了无数的钱为父亲治病，父亲的病仍未医好。最终周伯宜于1896年10月离开了人世。家道的衰败，遭遇白眼，得不到帮助，使鲁迅认识到了世态炎凉，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

①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③ 同上。



图为鲁迅家乡的当铺。鲁迅少年时经常出入当铺，为父亲治病筹钱。



鲁迅二弟周作人(1885—1967年)



鲁迅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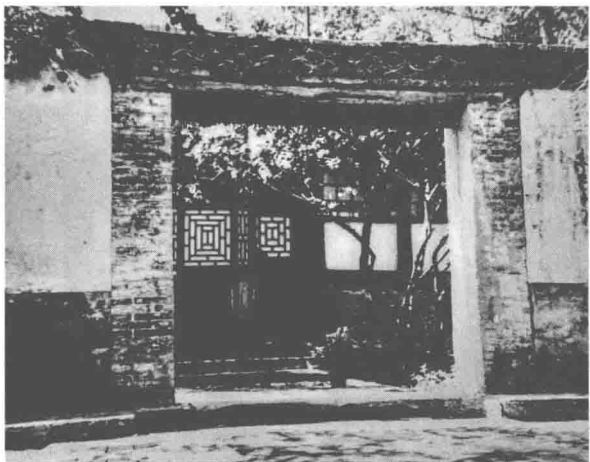
兄弟失和的影响

由于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种种遭遇，又由于后来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尽管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曾短暂地在绍兴居住、工作过，但是，自从卖掉祖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住过，甚至很少提到绍兴。

鲁迅对两个弟弟，尤其是与他一起留学日本，有着共同爱好和事业的周作人，关怀备至。听说北大需要教希腊文学的教授，马上介绍周作人来北京，“兄弟怡怡”是对他们当时最好的写照。鲁迅曾留心家乡绍兴的文献，编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署名却写二弟周作人（1915年）。搜辑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沉》，原也想用周作人的名字刊行。对于二弟周作人，鲁迅可以奉献自己的所有，包括名和利。1919年他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出售后，就在北京购得公用库八道湾一所大宅，空间极大，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好友许寿裳戏称：“可以开运动会。”^①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二弟作人和三弟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将其视同己出，处处为他们考虑。大宅内房间特别多，鲁迅亲自买建材，参与房屋设计，里里外外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并把八道湾周宅最好的位置后院让给两个弟弟的家庭和母亲、朱安居住，自己却住在进门的地方，要为这个大家庭“保驾护航”。鲁迅想从此安安稳稳地在北京过太平日子，用不着在绍兴看家族里面守旧人士的白眼，也用不着遵守家乡的陈规陋习。

当鲁迅带着一家老小定居北京，憧憬着从此大家庭团聚在一起的和谐生活时，可现实并不如他所愿。由于教育部欠薪，大家庭的生活开销却并没有相应地紧缩节俭，鲁迅只能不断地举债，纵观其1920年日记中，多为借还债记录，几乎是在借债中度日。那时候，这个大家庭的开销是由鲁迅和周作人承担的。周作人刚到北京工作，工资低一点；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多年，又在高校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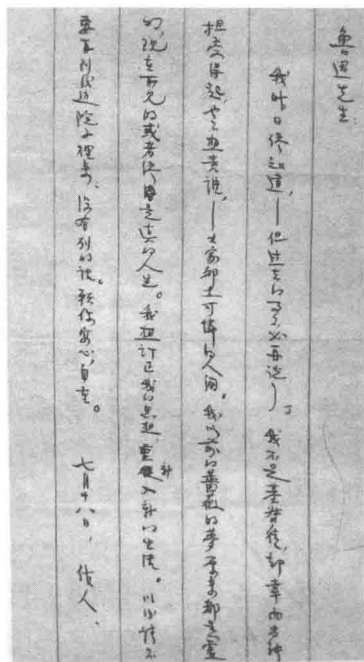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第71页。



图为鲁迅亲自设计、购买建材、监工建成的八道湾寓所。鲁迅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初期定居于此。

职，收入高一点，当时还没有儿女，开销并不大。按理稍微多付一点也就行了，他却把全部收入交给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由她当家。作为长兄的鲁迅愿意多承担一些责任，认为一家人能和睦地住在一起，就是自己心里的理想。然而裂痕在悄悄出现，鲁迅却毫不察觉。被视若同体的二弟周作人突然有一天发难。

1923年7月的一个闷热的日子，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交给大哥。那是一封绝交信，上面这样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寥寥几行，将几十年来兄弟间的恩义，交割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鲁迅万没想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致鲁迅的绝交信。

到，曾经那样亲密的兄弟，形影相随的二弟，竟会以这样一种绝情之态，置自己于绝地。他在收到二弟绝交信当天的日记上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①他 very 希望能与老二当面沟通，解释一下，或问清缘由，没想遭到周作人的断然拒绝。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鲁迅又一次体现出长兄风范，立马搬出八道湾十一号，住到临时租用的砖塔胡同寓所。第二年春夏，他购下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内一所小四合院，将母亲与朱安从八道湾十一号接过去住。初夏某日，他走进八道湾十一号，想

取回一些书物，没想到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一场激烈冲突。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②从那一回后，兄弟俩此生再无相见之日。兄弟失和在鲁迅心头留下的伤痛，始终如影相随，伴随终身。

① 《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

② 《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1923年8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暂时租居砖塔胡同61号。

据说，周氏兄弟失和，主要原因出自二弟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尽管在日本她的出身并不富裕，嫁到中国后，生活上却极尽奢华。鲁迅作为长兄，叮嘱周作人几句，要他规劝自己老婆节约一点，这就引起羽太信子内心的嫉恨。但羽太信子表面的恭敬蒙蔽了鲁迅，后者以为接受了他的规劝。想不到最后以关系决裂而告终。事后兄弟俩都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始终没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其中的是非曲直。老大鲁迅在文章中只字未提兄弟失和之事，老二周作人也在文章中闪烁其词，引来圈内外人士的无数猜测，直到如今还众说纷纭，成为鲁研界的一桩悬案。

周氏兄弟失和，作为长兄的鲁迅又一次在心理和生理上受到极大的冲击，“兄弟永不分家”的誓言被无情地击碎。鲁迅在离开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八道湾住宅后不久，生了一场大病，在很长时间也走不出阴影，心灵伤口的血一直流到了生命的尽头。

逝世前的最后一场论战

鲁迅晚年多病，1935年末，他写了一篇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副标题就叫“关于‘舒愤懑’”。这“愤懑”二字可以说较为准确地概括了鲁迅晚年的心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身体不适无疑会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反之亦然，恶劣的心态肯定会加剧病情，并且使脾气越来越坏，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对于鲁迅来说，最使他痛心的并非正面之敌的刀斧，而是友军从背后误射的流弹。在1936年鲁迅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场“两个口号”论争，正印证了这一点。

1936年7月17日，鲁迅给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年3月和5月的两次生病，并说：“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① 信中所谓“小英雄们”、“新英雄们”，系指“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周扬、徐懋庸等；“杀我祭旗”是指鲁迅对这个口号持异议之后，对方冠鲁迅以“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就是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的真实心境。

其实，这已不是鲁迅在上海第一次处于背后受敌的“待遇”。早在1928年鲁迅刚来上海不久，原来踌躇满志准备一起合作的创

^①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第117页。

造社成员，突然转过身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甚而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令刚到上海的鲁迅措手不及。

“两个口号”论争，是鲁迅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文坛论争。“国防文学”原来是苏联文学的一个概念，最初由周扬在1934年10月27日《大晚报》上作的介绍。“那时候没有把‘国防文学’当作一个文学运动的口号来提。”^①一年以后，夏衍在史沫特莱处读到巴黎《救国报》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接着，“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②由于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与党中央高层失去联系，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从各种渠道获得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最新决策，于是这些重要的最新“精神”都立即在左翼文艺界内被“传达”、“学习”，作为他们对于共产国际会议精神和上级党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和贯彻。“国防文学”的口号便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首先由周立波于1935年底发表《关于“国防文学”》，全面倡导和阐述了口号的意义，接着，更在1936年2月第1卷第11期《生活知识》杂志上推出“国防文学”特辑。这一口号的中心是呼唤“国家观念”，歌颂“民族英雄”。周立波阐述说：“我们的文学，

①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93页。

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①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②以上观念，粗看起来，似乎没错，但是，它却忽视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及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背景，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党政府会为了一致对外抗战，改正他们的独裁主义思想。显然周扬等并没有将代表自由民主力量的民族主义与独裁者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存在其潜在的牺牲民主信念的危险。

在这一点上，鲁迅等人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尤其在这段时期，左联解散，更使得鲁迅忧心忡忡。一个象征中国作家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甚至让多少青年为之付出鲜血与生命的组织，就这样在少数“领导”的操办下悄然而逝了！连鲁迅这样被奉为“精神领袖”的人也不得过问。鲁迅在1936年5月2日致左联党团书记徐懋庸信中讲到：“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③因此，鲁迅后来拒绝参加周扬等组织的所谓“中国文艺家协会”，立即便引来“破坏

① 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刊于《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5年第12期）。

②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③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统一战线”甚至“托派”的流言与攻击。在左翼文艺界领导层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引起争论的时候，鲁迅一开始是冷静地观察，并没有主动介入。就在这个时候，原左联负责人、也是鲁迅相当信任的朋友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特派员从延安来到上海，老朋友相见，分外激动。兴奋不已的冯雪峰却意外地觉察到鲁迅精神状态与自己的巨大反差：“他当晚说的许多话大半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①是的，鲁迅已经身心疲惫了，1936年反复发作的肺病也催促他尽早从“奴隶总管”的皮鞭下脱身出来，好好地休息休息。冯雪峰经过与胡风的认真商讨，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长远利益，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征得了鲁迅的首肯，最后由胡风起草完成文章发表。这便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新的口号既突出了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又继续追溯将民族勃兴的诉求与五四文学传统紧紧相连，从而在民族主义的呐喊中贯注了现实反抗的不屈意志：“五四以来，形成了新文学底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底生活真实。”^②尽管新的口号并没有对“国防文学”提出任何批评，而且还特别声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底主题的”，“是统一了那些主题，并不是解消了那些

①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② 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刊于《文学丛报》（1936年6月第3期）。